

論中國取得常任理事國席位過程中的美國因素

◎ 鍾子娟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戰區，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和卓越貢獻。在此期間，中國也通過廢除不平等條約體系、以大國身份參與國際事務¹、在盟國最高級會議上與美英首腦同桌議事並與美英蘇發表共同宣言等一系列事件確立起了近現代意義上的大國地位，並最終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形式使這一大國地位得到了法理肯定。雖然這種名難符實的大國地位終歸只是形式上的，缺乏足夠的、與之匹配的國家實力相支撐，但它對於中國以大國身份走向世界、發揮重大國際作用的起點意義卻值得肯定。而中國這個自近代以來屢遭列強侵略、極貧極弱的半殖民地國家，何以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取得基本為各國所認同的大國地位？這個問題雖不至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卻至少是一個饒有意味的話題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目前學界對此的解釋集中於兩點，一是八年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巨大貢獻，二是美國的極力支持。若將視角縮小，專門探討中國取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原因，則還應加上當時國民政府積極務實的外交努力這第三項因素。

關於抗日戰爭之於中國大國地位的重要意義，學界已無甚爭議。正如《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一書所言，「聯合國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產物，中國對反法西斯戰爭所作的貢獻也就是對創建聯合國的貢獻。沒有中國全民族的抗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很少外援的情況下幾乎獨力堅持抗戰四年半，後來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戰線的情景是難以想像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全民族的艱苦抗戰、數千萬人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²對於前文所述之第三項因素，即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在近年的一些著述中學者們也給予了相當肯定。金光耀在《國民政府與聯合國的創建》一文中就明確指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確立的大國地位，固然首先是中國軍民艱苦抗戰的結果，但也與國民政府的這一外交努力分不開。」³然而當研究涉及到其中的美國因素時，人們的關注點卻似乎過度聚焦於美國企圖在戰後利用中國的所謂自私心態。誠然，我們不能忽略其行為動機，但一味關注政策動因則可能使我們對政策的客觀影響產生理解上的偏差；且在現代國際政治中，一項理性的外交政策其首要目標是且應當是對其國家利益的維護，這無可厚非。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暫且撇開美國當時的戰略意圖，首先進行基於史實的結果分析，以期對美國在中國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這一過程中所起的客觀作用作出較為公正的再評價。

一 美國因素的客觀作用

無須贅言，中國的大國地位是中國軍民艱苦抗戰的結果，但如果就此將其視為中國確立大國地位的充分條件則顯然缺乏事實依據，因為這一結論的得出至少有賴於兩大前提：其一，中

國的貢獻得到了各國公認；其二，只要各國公認中國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就順其自然地成為了世界大國。很明顯，這兩個前提都值得商榷。首先，我們對中國貢獻的高度評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事後判斷，但中國大國地位的基本確立完成於戰爭期間，這時戰事尚未塵埃落定，盟國即使對中國在戰爭中所作之貢獻有所體認，也斷不同於我們現在的這種蓋棺定論。另一方面，大國地位的自然確立主要基於強大的國家實力，但二十世紀40年代的中國顯然不具有與大國身份相匹配的實力，這便排除了中國大國地位自然獲得的可能。換言之，中國在二戰期間取得的大國地位不同於那種依靠國家實力而逐漸形成的大國地位，歷史資料與相關研究也表明，中國之所以成為大國的確與他國的極力支持（或者說是有意抬高）有關。那麼，中國能得到他國支持的原因就更不可能是極具主觀彈性的所謂歷史貢獻了，必定存在著更為現實的因素。本文認為，其原因主要在於中國的戰略重要性。而這種戰略重要性又在軍事和政治兩個層面有所不同。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主要是針對盟國而言的，但三大盟國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從一開始就存在分歧。

首先提出要與中國保持積極有效的接觸並提高中國地位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邱吉爾則對羅斯福的「中國大國化」政策大為不滿。當羅斯福在阿卡迪亞會議上推舉蔣介石為中國、泰國和印度支那的盟軍最高指揮官，並提出在重慶設立一個聯合計畫參謀部以建立蔣介石與駐印度和西南太平洋地區盟軍司令部之間的聯繫的時候，邱吉爾感到惱怒。他後來抱怨說，他在華盛頓「發現中國在相當多的美國人的心目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層也是如此，這是令人奇怪地感到不相稱的」。他認為，美國人不應「把中國看作幾乎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大國，並且帶著偏愛把中國軍隊同俄國軍隊相提並論」。⁴總的說來，他在「信念」和「價值標準」上並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事實上，他也幾乎從不掩飾對中國的輕蔑。他曾刻薄地說：「把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⁵ 1942年10月，他曾告訴外交大臣艾登，不能「把重慶政府看作一個世界大國」。⁶ 1943年3月，羅斯福在華盛頓會見艾登時說，在解決世界性問題時需要把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同等看待，艾登對此不感興趣，他向邱吉爾報告了會談情況，邱吉爾則很直白地說：「把中國同英、美、俄等世界大國等同起來的說法是極不正確的。」⁷當時英外交部根據「羅艾會談」精神擬發表一項聲明，其中提到：「在處理我們即將面臨的重建世界的廣泛問題上……我們把中國看作是能作出最偉大貢獻四大國之一。」⁸邱吉爾不以為然，堅決反對這項聲明，他再次強調了他關於中國問題的觀點：「說中國將在歐洲事務中擁有『超出禮節性之外』的發言權，抑或說，為著歐洲的利益，中國的重要性將超過法國或波蘭、或者將取代奧—匈帝國的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哪怕是超過最小的，但古老而又歷史悠久的盟國，如荷蘭、比利時、希臘、南斯拉夫等——這種說法根本不屑一顧。」⁹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與邱吉爾相近。他認為，「無論是軍事實力還是對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中國都夠不上大國的標準」¹⁰。當1943年11月羅斯福在德黑蘭會議上提出四大員警的構想時，斯大林表示憂慮：如果中國試圖出面解決歐洲的爭端，歐洲人將如何反應？他又說，以他的看法，中國不夠強大到足可擔負此一世界員警角色，因此建議創立一個地區委員會時代，來維持和平。¹¹

最終，羅斯福的觀點佔了上風。英蘇兩家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美國扶持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做法。但在籌建聯合國的具體過程中，美國和英蘇之間未根本消除的分歧則使中國走向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道路更顯崎嶇艱難。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上，英國外長艾登反對中國作為四強之一參與簽署《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並因此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展開了激烈的爭辯。¹²蘇聯的態度比英國

更為激烈，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堅決反對中國作為簽字國，他「認為在僅有三國參加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是不合適的」¹³。赫爾為說服莫洛托夫頗費了些口舌。他說：「對於中國形勢，美國政府已經作了並且正在作著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來，把中國排除出四國宣言是不可能的。我國政府相信中國在戰爭中已作為四大國之一出現在世界舞台之上，現在在宣言問題上由美、英、蘇三國將其當面摒棄，完全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區產生極其惡劣的反應。不論在政治方面還是軍事方面，從而可能需要我國政府作出種種調整，以保持太平洋地區政治和軍事形勢的恰當穩定……再者，我國公眾可能把從宣言中排除中國解釋為我國政府與蘇聯政府一起將中國拋出戰爭舞台，因此，一旦獲悉此訊，我國公眾輿論將會失望地分裂並受到傷害……。」赫爾花了將近一個星期的時間來說服莫洛托夫，甚至表示將不惜以會議達不成協議為代價。他最終說服了莫洛托夫。10月29日，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受權與美、英、蘇三國外長一起在關於普遍安全的《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簽字。

正是根據這個宣言，中國參加了1944年夏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發起了1945年春的三藩市會議，而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¹⁴有的歷史學家認為，「簽字於《莫斯科宣言》是中國正式成為四強之一的標誌」。¹⁵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作用是關鍵性的。如果沒有赫爾極力說服，中國勢必失去在《四國宣言》上簽字的機會，這將直接影響到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和三藩市會議上的中國地位問題，而這兩次會議之於聯合國籌建又是至關重要的。

在籌建聯合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蘇聯代表藉口在太平洋戰爭中保持中立，拒絕與中國代表同桌討論問題¹⁶，於是會議改以開羅會議模式舉行，第一階段於8月21日至9月28日在美、英、蘇三國間進行，第二階段於9月29日至10月7日在美、英、中三國間進行。會議過程上，英國代表聯合蘇聯代表，藉口中國的豫湘桂大潰退重提「三強」觀點。圍繞會議後發表的聲明，蘇聯主張以美、英、蘇三國的名言發表，英國主張除此之外應加上聯合國名。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顧維鈞認為，蘇方的主張很明顯是以將中國排除在外為主，在蘇聯方案中明顯包含著「中國不是一個大國，不能與其他三個國家相提並論」的中國認識，對此，雖說英國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同蘇聯一樣決不是把中國作為大國來對待」¹⁷。

直到1945年三藩市會議上，蘇聯方面還重提「三強」觀點，並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表決程式、否決施用範圍、國際託管制度以及區域性組織等問題上有頗多針對中國代表團的非難之舉。英國代表也曾反對中國首席代表擔任會議主席。

綜上，英蘇兩國一開始都極力反對「中國大國化政策」，雖然後來迫於美國的極力堅持勉強認同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但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和三藩市會議上對中國仍多有刁難和排擠之行，在此過程中，中國一直是應美國的邀請被作為聯合國方面的大國的。從這一點來看，無論美國出於何種考慮而實行「中國大國化」政策，它在客觀上對於中國成為五大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所起到的作用是相當積極的，這種美國因素至少作為一項必不可少的關鍵因素與中國貢獻這一基礎性因素一起，構成了中國取得常任理事國席位所不可偏廢的兩大原因。

既然我們對美國因素作出了肯定評價，那麼，追問美國為何這樣做就顯得十分必要了。這將我們引向了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即美國扶持中國的政策動因。但是對於這個問題，「我國史學界不僅對此尚缺乏系統的研究，而且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¹⁸。籠統地說，「美國的

中國大國地位政策是多種因素交織匯合、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包括（1）美國戰時軍事戰略的需要；（2）美國重建國際新秩序的需要；（3）美國人的中國觀；（4）美國對華外交傳統，即門戶開放政策；（5）羅斯福的「親華情結」。¹⁹如前所述，中國能在戰時得到美國的極力支持並在短短幾年內最終確立大國地位，必定存在著極為現實的因素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本文認為，這種決定性作用在於中國的戰略重要性。限於篇幅，本文將主要討論這種戰略重要性的政治方面，即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的構想與中國大國地位之間的關係。

二 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的構想

「當盟國在1942年至1943年還承受著巨大的軍事壓力時，蘇聯、美國和英國就已經啟動了對戰後國際秩序進行評估、規劃和安排的機制了。」²⁰美國在這方面的最早實踐可以追溯到1939年12月羅斯福下令成立「和平與改造問題委員會」，負責研究戰後美國為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什麼基本原理。一言以蔽之，羅斯福政府對戰後世界的構想可以歸結為「自由國際主義體制化」，但事實上，羅斯福本人「提出的國際規則和由美國國務院的一些委員會制定的國際準則有著巨大的差異」²¹。

1941年12月，美國國務院設立了一個由國務卿赫爾任主席的「戰後對外政策諮詢委員會」，負責擬訂解決戰後問題的各種方案。在這個委員會裏負責「制定戰後秩序的大多數美國官員都是威爾遜主義者，他們反對由實力政治、實力均衡和勢力範圍構成的舊國際體系，並相信可以通過制定國際規則和促進大國的團結來形成一種新的國際秩序」²²。雖然他們在兩個重要問題——堅持國際聯盟的繼承者必須擁有強制執行決議的權力、認為實現國際經濟的繁榮是軍事安全的必要前提——上與威爾遜的思想不盡相同，但總的說來，以赫爾為代表的國務院官員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聲明與威爾遜的理論分析基本一致。在赫爾看來，這場戰爭的「長遠目標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穩固和廣泛的基礎上實現人類自由和基督教道德』的偉大任務，美國將領導這場實現世界民主的運動」²³。基於此，國務院認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手段是建立一個更有力、更有效的新國聯。

與國務院傾向於威爾遜式理想主義的設想不同，羅斯福想要建立起一個戰後安全體系，由「美國、英國和蘇聯——希望最終還有中國——將形成一個擁有壓倒性力量的聯盟。這些大國組成一個執行委員會，將合作對付對和平的威脅，不管它們是來自戰敗國還是來自任何其他國家」²⁴。通過對30年代趨勢的分析，羅斯福確定自己對「四國員警」概念的熱情是正確的；成功的戰時合作又鼓勵了這樣的熱情，而且它們由於羅斯福對斯大林戰後意圖的評估以及他從斯大林那裏得到的對合作性戰後安全體系概念的籠統認可而進一步加強。他相信，現代戰爭的特點決定了小國和弱國將不再有能力保衛它們自己的安全。如果小國為了阻止或反抗大國的侵略而武裝自己，沉重的軍務負擔將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因此，小國還不如放棄軍務，而把自己的防務委派給大國。四大國將會負責其他弱小國家的安全。擁有強大軍事實力的四大國員警既可以進行威懾，也可以制止衝突。在處理其他國家的麻煩衝突時，四大國員警可以通過封鎖的方式，即切斷衝突各方獲得軍事生產的能力來消除衝突。當封鎖被證明無效時，四大國還可以轟炸侵略者直至其投降。既然戰爭結束後除四大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裁軍，較小的侵略國就沒有辦法再保衛自己並對抗四大國了。這種軍事實力上的不對等對預防衝突發生同樣有效。此外，當世界主要國家不再將生產資源用於整軍務戰時，和平也就會更有希望。加拿大學者卡列維·霍爾斯蒂認為羅斯福對戰後安全體系的設想

與霍布斯哲學的民主推理酷似，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則認為羅斯福「四大員警」觀念的架構與梅特涅的神聖同盟相像，在美國學者戈登·克雷格與亞歷山大·喬治合著的《武力與治國方略——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一書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羅斯福構建國際安全體系的方針是基於權勢現實的，而在美國史學家約翰·加迪斯看來，羅斯福的戰後規劃傾向於依靠包容來遏制。²⁵在這些尚未平息的爭論中，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即羅斯福的「大構思」是以一個大國共管體制來維持和平，而在這個體制當中，大國合作是他最為看重、多次強調且貫之始終的核心。

最終，「在赫爾和斯退丁紐斯的指導下，由國務院提出的方案逐漸成為美國的官方政策」²⁶。美國政府關於聯合國的最終方案採納了羅斯福關於四大國員警的思想，但是賦予了小國更大的責任和義務。這個最終方案沒有提及在《大西洋憲章》中得到闡明的裁軍原則，但對四大國的國際員警地位有清楚的表述。「簡單地說，這個方案就是透過四大員警觀念的修正，恢復威爾遜的集體安全體制。」²⁷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羅斯福本人還是國務院的最初構想，以及最終形成的正式方案中，給予中國大國地位都是這種世界新秩序得以建構的重要環節。

三 中國在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構想中的意義

首先，把中國列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其象徵意義對於聯合國的順利成立在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兩方面都大有好處。一方面，「中國作為世界組織的最高理事會的一個成員，就會使這個組織具有世界性，而不是純屬歐洲地區。這就有利於把亞洲號召起來」²⁸，換言之，中國的加入有助於增強聯合國的全球代表性。另一方面，「羅斯福相信，這一次至關重要的是，美國不應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回到孤立主義對外政策。然而，他完全無法想當然地認為美國公眾輿論和國會不會施加壓力，要求回到美國傳統上那種避免『糾纏不清的聯盟』政策」²⁹。因此，把中國拉入安理會，「至少把中國看成是個大國」³⁰，有利於擬議中的聯合國在美國國內取得合法性和公眾認可。畢竟，1919年美國拒絕加入國聯的主要原因乃是由於民眾以及相當數量的國會議員認為，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的作為和最終成立的國聯背離了他們所熱切期望的那種國際社會新秩序。而羅斯福也深知「中國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左右美國輿論」³¹。1942年美國的民意調查表明，有80%到86%的人相信，中國在戰時和戰後可以可靠地同美國合作。³² 羅斯福這位一向奉民意調查為圭臬的總統顯然清楚，扶持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將有助於為戰後國際主義政策奠定基礎。

如果說一個崛起的大國之于聯合國順利成立的意義更多地在於象徵意義上，那麼，它對大國合作這一核心理念的意義則要現實得多。

「羅斯福把中國列入四強之內，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個亞洲夥伴。」³³對此，我們可以從羅斯福對歐洲的考慮中獲得啟示。「1944年2月27日……羅斯福致邱吉爾說：『你千萬別要求我把美軍留在法國。我辦不到！我必須把他們全都帶回國……』」換言之，他希望英國能夠擔負起防衛歐洲的任務，而不是依賴美國。羅斯福毫無意願把美軍長期部署在歐洲，更不想以駐軍歐洲來制衡蘇聯，因為他認為美國民眾絕不會支持他這麼做。³⁴基於同樣的精神，羅斯福也不希望由美國來承擔遠東的戰後穩定。但同時，他也意識到，通過二戰，日本將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失去作為一個東方大國的資格。如此一

來，遠東就將出現一個巨大的權勢真空，如果不能迅速找到一個對待這個權勢真空的方式，那麼戰後的遠東將陷入尖銳的競爭和衝突。正如他不想看到戰後歐洲陷入混亂一樣，他同樣不希望遠東失去穩定。如前所述，羅斯福設想用大國共管體制來解決這個問題，通過建立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來維護戰後和平。於是，在歐洲，他需要英國承擔起重任；在亞洲，他看中了中國來填補權勢真空。正如赫爾在其《回憶錄》中所說：「我們應該盡一切力量援助中國，使她強大和穩定，我從未動搖過這種信念。……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作為東方大國的日本將銷聲匿跡。因此，嚴格地講，唯一重要的東方大國就是中國。美國、英國、俄國也是太平洋的大國，然而，她們的重大利益都在別處。如果遠東要保持穩定的話，那麼做任何安排時都要保證中國處於舞台的中心。」³⁵而一種對遠東地緣政治的分析則無疑證明美國當時設想的以中國為中心的遠東戰後設想是合理的。這種地緣政治觀點認為，「十九世紀末出現的新的（遠東）戰略布局延續到整個二十世紀。該地區共有五個大國：兩個屬於該地區的國家，中國和日本；與該地區密切相連的兩個國家，俄國和美國；英聯邦則屬於該地區的邊緣性質，英國及其後來的繼承人印度是南亞的主要大國。二十世紀初明朗化的亞洲戰略格局維持了整整一個世紀。大國的利益都集中在幾個地區：太平洋島嶼、中國台灣、印度支那半島和南中國海、麻六甲海峽、喜馬拉雅山和中國西藏、中亞和中國新疆，蒙古、西伯利亞、中國東北、鄂霍次克海及其周圍的領土以及朝鮮。五大國中沒有一個是對所有這些地區有重大安全利益的。……由於中國幅員遼闊以及它的中心地理位置，誰向這幾個地區伸手都會觸犯到中國的利益。」³⁶

如前所述，大國合作是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設想的核心，其中羅斯福又尤其強調美蘇之間的合作，他十分希望戰時美蘇合作能繼續到戰後，這是實現美國關於戰後秩序的設想的重要前提。但他很早就認識到，這一合作可能被中蘇之間的不信任和衝突所破壞，同時，如果中國爆發內戰也極可能使美蘇兩國都牽涉其中致使美蘇合作出現危機。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在回顧他於1943年9月與羅斯福總統的一次談話時講到，羅斯福最擔心的是在擊敗日本後中國爆發內戰：那時的危險是蘇聯將站在共產黨人的一邊進行干涉，西方列強將出於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迫而支持反共的一方。他說，「那時我們就可以看到與我們曾經目睹的、內戰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戰爭的規模更大。」³⁷為了避免出現這種他所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美國希望通過加強中國的國際地位，讓中國以大國地位簽署一份由四大國發表的有關國際行為準則的聯合聲明來取得蘇聯的保證、限制蘇聯的對華野心，從而使國民政府在中蘇關係和國共關係兩方面有更多的安全感，以此緩和中蘇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而把中國拉入安理會，則可以實現赫爾的願望——「如果中國處於大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之中，而不是局外人的話，那麼從國際和國內對中國的事態發展施加影響就會容易得多。」³⁸

另一方面，羅斯福也十分清楚美國與蘇聯之間在戰後出現分歧甚至衝突的可能。這時，他便需要一個親美且強大的中國站在美國一邊向蘇聯人施壓。事實上，他確向別人表露過「需要中國作為『四員警』之一來制衡蘇聯」³⁹的目的。羅斯福總統在堅持中國成為大國理事會的成員時對艾登說：「在我們與俄國發生嚴重的政策衝突時，中國將毫無疑問地站在我們一邊。」⁴⁰換言之，羅斯福相信，在戰後美蘇之間可能的衝突中，中國可以成為這種衝突的緩衝地帶，結合上文我們可以看出，他至少不希望中國成為這種可能衝突的策源地。而要實現這個目標，他所選擇的手段之一仍然是給予大國地位。

此外，在戰後殖民地託管問題上，美國也需要一個強大而友好的中國的幫助。雖然到1945年後，他在一次國會會議上不得不說，「勢力範圍是美國沒有力量去消滅的現實問題」⁴¹，但

美國關於戰後世界的設想確實包含了強烈的反殖民色彩，並且為之努力過。而在羅斯福的考慮中，中國將是聯合國在亞洲的主要託管國。

四 餘 論

正如美國學者孔華潤所說，「中國從中受益這一事實既非美國政策本意，也是不可否認的。羅斯福的東亞政策沒有什麼可使美國人抱怨的——而中國人也沒有理由為之感激」⁴²，美國在戰時採取給予中國大國地位並扶持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對華政策，是與他們對戰後世界的構想相一致的，其中一以貫之的則是這一構想的核心要義，即大國合作。

基於此，對於雅爾達會議上美蘇之間有損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這也同樣體現了美國試圖維持美蘇合作的意圖，只不過這一次美國是以將中國北方劃給蘇聯作為勢力範圍為代價，換取戰時合作的繼續維持以及鼓勵蘇聯加入那個美國所設想的世界新秩序。不幸的是，這一次中國成了犧牲品。

參考文獻

- 《羅斯福選集》，[美]佛蘭克林·德·羅斯福著，關在漢編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
- 《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美]羅伯特·達萊克著，商務印書館，1984年
- 《美國與近現代中國》，陶文釗、梁碧瑩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
- 《美國對中國的反應》，[美]孔華潤（Warren I. Cohen），張靜爾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
-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美]鄒讜著，王甯、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大外交》，[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涉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
- 《顧維鈞與中國外交》，金光耀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美]羅伯特·A·帕斯特主編，胡利平、楊韻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中美關係的歷史性展開1941-1979》，[日]山極晃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 《和平的緯度：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研究》，門洪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中美關係與東亞國際格局》，陶文釗、杜瑞清、王旭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韓永利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
- 《武力與治國方略——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美]戈登·克雷格、亞歷山大·喬治著，時殷弘、周桂銀、石斌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
- 《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美]孔華潤主編，新華出版社，2004年
- 《中美關係史1911-1945》，陶文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 《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衝突與國際秩序》，[加]卡列維·霍爾斯蒂（Kalevi J. Holsti）著，王浦劬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遏制戰略：戰後國家安全政策評析》，[美]約翰·加迪斯著，時殷弘、李慶四、樊吉社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 《大戰略的國內基礎》，[美]理查·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亞瑟·斯坦（Arthur A. Stein）主編，劉東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戰爭與和平的大戰略》，[美]保羅·甘迺迪編，時殷弘、李慶四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註釋

- 1 如1942年2月蔣介石訪問印度調解印度國大黨與英印當局的矛盾，試圖說服國大黨參加反日聯合戰線。
- 2 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388頁
- 3 金光耀：《國民政府與聯合國的創建》，《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
- 4 [美]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下），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473-474頁
- 5 費正清、費維愷：《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612頁
- 6 同上，第556頁
- 7 [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卷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2頁
- 8 同上，第582-583頁
- 9 同上，第583頁
- 10 [加]卡列維·霍爾斯蒂（Kalevi J. Holsti）：《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衝突與國際秩序》，王浦劬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6頁
- 11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75頁
- 12 徐光壽：《抗日戰爭與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民國檔案》1996年第2期
- 13 [美]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下），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600頁
- 14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45（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227-228頁
- 15 《戰時通訊》，第162頁；《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第914-915頁。轉引自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45（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228頁
- 16 沈志華：《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 17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419頁，中華書局，1987年。轉引自[日]西村成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 18 趙志輝：《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的中國大國地位政策的起源》，《史學集刊》2000年8月第3期
- 19 同上
- 20 [加]卡列維·霍爾斯蒂（Kalevi J. Holsti）：《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衝突與國際秩序》，王浦劬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3頁
- 21 同上，第216頁
- 22 同上，第214頁
- 23 同上，第214頁
- 24 [美]戈登·克雷格 亞歷山大·喬治：《武力與治國方略——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時殷弘、周桂銀、石斌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34頁
- 25 對羅斯福構想的闡述主要參照[加]卡列維·霍爾斯蒂：《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衝突與國際秩序》，王浦劬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美]戈登·克雷格、亞歷山大·喬治：《武力與治國方略——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時殷弘、周桂銀、石斌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美]約翰·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後國家安全政策評析》，時殷弘、李慶四、樊吉社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 26 [加]卡列維·霍爾斯蒂 (Kalevi J. Holsti) : 《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衝突與國際秩序》，王浦劬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8頁
- 27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62頁，
- 28 [美]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王甯、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頁
- 29 [美]戈登·克雷格 亞歷山大·喬治：《武力與治國方略——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時殷弘、周桂銀、石斌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30頁
- 30 [美]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王甯、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頁
- 31 [美]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193頁
- 32 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下），商務印書館，1984年，轉引自趙志輝：《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的中國大國地位政策的起源》，《史學集刊》2000年8月第3期
- 33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75頁
- 34 同上，第351頁
- 35 [美]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王甯、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頁
- 36 [美]羅伯特·A·帕斯特主編：《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胡利平、楊韻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5-316頁
- 37 Sumner Welles ,op. cit . , pp. 151 - 152. 轉引自趙志輝：《佛蘭克林·羅斯福的中國觀》，《美國研究》2002年第2期
- 38 [美]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王甯、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頁
- 39 Michael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 York:1979),pp.98-99,177-178;又見:Dallek,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390-391;Thorne,Allies of A Kind, pp.307-308 轉引自[美]約翰·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後國家安全政策評析》，時殷弘、李慶四、樊吉社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第8頁
- 40 [美]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王甯、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頁
- 41 [美]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下），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721頁
- 42 [美]孔華潤 (Warren I. Cohen) : 《美國對中國的反應》，張靜爾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40頁

鍾子娟 1986年生，四川綿陽人，南京大學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2003級本科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一期 2006年6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一期（2006年6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